

# 以五维协同打造世界培育钻石之都

张杰

培育钻石的崛起,是科技突破与消费升级共同催生的产业革命。郑州锚定“世界培育钻石之都”目标,绝非超硬材料产业的延伸,而是以“创新科技+珠宝时尚”双重属性为核心的全新产业布局。唯有立足产业、创意、品牌、市场、载体五大维度,打通产业端与消费端双循环,实现各环节协同发力,方能将全球产能优势转化为价值优势,铸就全球产业新标杆。

**产业筑基:构建“全链贯通+双端赋能”的核心生态**

产业是世界培育钻石之都建设的根基,需彻底剥离超硬材料的工业属性认知,打造从研发到消费的闭环生态。在产业端,强化“技术研发—培育生产—切磨加工—终端零售”全链条布局,巩固全球产能领先地位;针对切磨环节短板,建设智能切磨加工基地,推动自动化切磨与高技能人才高效协同,破解“中国坯、海外磨”的利润流失困境。

在消费端,推动产业与消费需求精准对接,聚焦“悦己需求”“情感纪念”等消费场景,开发大克拉彩钻、DNA 纪念钻等差异化产品;延伸功能化应用赛道,开辟第二增长曲线,实现“产能高地”向“价值中枢”的跨越。

**创意引领:激活“文化赋能+个性定制”的价值引擎**

创意设计是提升产品附加值的核心,需构建“全球智慧+本土特色”的创新设计体系。搭建国际化创意平台,每年举办培育钻石大赛,汇聚全球设计力量——由中原珠宝创新研究院主办的2025“克拉光芒”国际培育钻石大赛的成功举办为产业注入全创新新活力;同时联合港澳台设计师协会共建培育钻石创意设计平台,在中原珠宝产业学院设立设计专业,定向培养兼具技术素养与美学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深挖文化内涵与消费需求,推动设计创新:将中国文化元素与现代时尚融合,开发生肖、非遗主题系列产品;打造“设计—孵化—量产—销售”的完整创意链条,设立创新基金,支持优秀设计作品落地转化,让创意从概念变为引领消费的爆款产品,推动产业从“制造”向“创造”升级。

**品牌塑魂:铸就“东方美学+全球认同”的价值符号**

品牌是世界培育钻石之都的核心名片,需破解“有产能无品牌”困境,打造多层次品牌矩阵。实施“公共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三维战略,通过技术创新与场景化营销提升影响力,未来5年,培育多个公共品牌、国内知名品牌及1~2个国际知名品牌,形成多

维品牌矩阵,同时吸引国际品牌设立区域总部,形成品牌集聚效应。

强化品牌差异化定位与文化赋能,讲好“中国技术+东方审美”的品牌故事,通过《郑州宣言》凝聚行业共识,推动品牌建设标准化、规范化,让“郑州钻石”成为全球认可的价值符号。

**市场拓界:打造“全球推广+多元场景”的消费高地**

市场是产业发展的引擎,需构建“全球枢纽+本土热点”的双循环市场体系。以“郑州钻石”公共品牌为原点全球化推广、渠道合作及授权经营,搭建共享库存平台与交易指数体系,争夺全球定价话语权,叫响“买钻石到郑州”的地理标识。

在消费端,打破“婚庆依赖”局限,推动场景多元化:联合电商平台与时尚机构,开展场景化营销,提升时尚消费占比;搭建“线上交易平台+线下体验店+直播基地”全渠道矩阵,通过沉浸式体验空间让消费者近距离感受钻石切磨工艺与定制服务。建立健全检验检测标准,实现与国际接轨,构建“定制+保养+回收”服务闭环,让郑州成为培育钻石消费的信任高地。

**推广载体:搭建“平台聚合+活动引流”的展示窗口**

优质载体是协同发力的重要支撑,需构

建“固定平台+流动活动”的立体化推广体系。加快河南省培育钻石推广中心载体建设,聚焦可视化自动加工、推广交易、检验检测、跨境电商等核心模块,构建全链条服务生态。

以展会赛事为流动载体,扩大全球影响力:举办培育钻石c产业大会、培育钻石国际珠宝展等活动,通过发布“郑州钻石”公共品牌标识、国际化检测标准、培育钻石推广语等方式,凝聚产业合力,让载体成为展示郑州培育钻石实力的全球窗口。

**协同发力:构建“五维联动+双端贯通”的生态闭环**

五大维度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产业筑基支撑创意转化,创意设计赋能品牌升级,品牌引领拉动市场扩容,市场需求反哺产业创新,推广载体聚合全链资源”的逻辑实现深度协同。产业端为创意、品牌提供技术与产能支撑,消费端通过市场反馈为产业、创意指明方向,推广载体则成为连接产业端与消费端的桥梁纽带。

这种“五维协同、双端共振”的发展模式,将彻底剥离培育钻石与超硬材料的属性绑定,推动郑州从全球培育钻石产能中心,跃升为集技术研发、创意设计、生产加工、推广交易、终端消费于一体的世界之都,在全球钻石产业格局中书写郑州辉煌。

(作者单位:河南省中原珠宝创新研究院)

## 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式

牛玉乾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蕴涵着中国人深厚的哲学智慧,凝聚着崇高的人生追求,承载着美好的道德情操,一直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度契合。

(一)

“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核心概念是“中”字。史书记载,中华文明从历史源头就形成了尚中、贵和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早在伏羲时代,崑山河洛的先人们,就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画出图、洛出书,画八卦而归为“中”了。至今,巩义市河洛汇流处的伏羲画卦台遗址,还述说着历史的过往。

《尚书·大禹谟》讲的尧舜禹口耳相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被公认为“圣人心法”。南宋理学家朱熹说,尧传给舜时,只说“允执厥中”,舜传给禹,又加上了12个字,成为“十六字心传”。之后传给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再经过周公、老子和孔子一脉相承下来。这就是圣人治天下之大法,也是个人修心之要诀。

《易经》讲“中行无咎”“阴阳相合”,《道德经》说“不如守中”“知和曰常”,《论语》则称孔子“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北宋理学家程颐解:“中者,天下之正道。”朱熹又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子思子的《中庸》释“执两用中”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爲舜乎!”“两端”者,是“过”与“不及”,执其两端循中道而行,是君子修德处世的底线尺度。《中庸》注释“守中致和”则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致”乃达到之意,即守中致和达到了极致,天地就归于正位,万物就生生不息。“守中”方能“致和”,“致和”也要“守中”。“守中”就是守正,守正就能正确。

所谓“思维方法”是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是人们通过思维活动实现特定目标必

须凭借的手段、途径或工具。执两用中是方法,守中致和是目标。西汉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宏论:“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所以,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正是中国人数千年来凭借以中为本、包容协和、勤劳勇敢、筚路蓝缕,开创中华民族大一统伟业的奥秘所在。

(二)

1939年2月,毛主席在《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中指出:“过犹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毛主席的著名文献《论持久战》,就是在反对亡国论和速胜论、即“过犹不及”两个极端的错误中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毛主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诠释了“中”哲理的深刻内涵,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针。

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时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关于姓“资”姓“社”这一精辟论述,是把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同中国实际的特殊性相结合,提出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精彩诠释,也是他以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式,开辟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理论前提。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高度评价说:邓小平“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

2012年11月上旬,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说:“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是因为“老路”和“邪路”都是脱离普遍性与

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都是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的错误做法。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三)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守正创新。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就是守中;守中方能致和,致和才会创新。只有守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守住“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住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才会创新出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业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因此,习总书记所强调的守正创新,就是中和之道传统智慧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是执两用中、守中致和思维方式在新时代的伟大探索。

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新时代的新实践无不贯穿着中和之道的精髓。譬如,新时代治国理政蕴含着制度创新、制度执行与制度监督的中和之道;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文化交流融合,塑造出新时代文化自信;在科技创新领域,学科交叉相互融合,形成了全新的发展链条。如此等等以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式,彻底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迷思,构建出中国式多元平衡与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体系。

2013年1月5日,习总书记在论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时,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他还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这是党和人民在当今世界安身立命、风雨前行的资格。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事情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来办,这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正确之道。”习总书记提出的“两个不能否定”这一伟大命题,高瞻远瞩,体现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

央,所具有的高超政治洞察能力、政治智慧和政治定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娴熟运用“执两用中”的中国智慧,恰当处理事关前途命运的“左、右”两种倾向,所起到的拨乱反正效果。

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习总书记提出的“两个不能否定”这一命题,直接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党执政根基的巩固、凝聚统一党心军心民心等一系列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深刻教育全国人民要正视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绝不能当糊涂人,而落入西方敌对势力构筑的陷阱之中,一举挫败敌对势力阴谋,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扫清了前进的障碍。

习总书记在以“两个不能否定”理论拨乱反正的同时,又多次强调:“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这段话阐明,如果唯“母版”是从,那就会走向极端的复古主义;如果唯“模板”是从,那就会走向极端的教条主义;如果搞“再版”和“翻版”,那就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只有坚持“两个结合”,才能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习总书记“居中”而胸怀全局,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同时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上的现代化,是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历史和未来联通起来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通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康庄大道。这条大道,正是从中国特色的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里得来的。

(作者系郑州日报社高级记者、原副总编辑)

## 低空经济：空域使用法治化破局之路

梅维佳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制定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将“坚持高质量发展”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建议》提出,“围绕低空经济等领域,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低空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发挥着促进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引擎作用。河南省《促进全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4—2027年)》为全省低空经济发展勾勒出清晰蓝图,然而低空空域使用仍面临多重制度困境,亟须构建低空空域使用制度体系,以法治护航低空经济腾飞。

**现实挑战: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困境**

低空经济的迅猛发展与空域使用制度供给的滞后性形成鲜明反差,三大制度困境严重制约低空经济产业潜力释放。

第一,低空空域使用权利基础缺失。我国《宪法》《民法典》均未对空域的权利属性作出规定,《民用航空法》亦仅将空域作为管理对象,未能赋予其应有的民事权利内涵。空域是否构成民法意义上的“物”,其所有权归属为何、使用权具备何种法律性质,所有权与使用权之间为何种逻辑关系等根本问题,均缺乏法律层面的清晰界定。这导致低空空域使用行为缺乏直接、稳定的权利依据,空域“能否飞”的问题长期处于悬置状态。由此,低空空域蕴含的巨大经济价值难以充分释放,其作为重要资源要素的战略属性被严重弱化,大量潜在空域资源处于闲置浪费状态。

第二,低空空域使用程度受限。对于使用条件,现行规则对低空空域使用多设定统一或笼统的技术与安全标准,未能针对农林作业、应急救援、旅游观光等不同应用场景的风险特征与运行特点,建立差异化的准入条件、设备要求和操作规范,导致部分飞行活动因“一刀切”的规定难以开展。对于使用权限,中央与地方具体事权分配模糊,地方政府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和必要的空域规划权限,难以因地制宜主动、灵活地配置低空空域资源。对于使用程序,低空飞行活动涉及军民航空管、公安等多个部门,空域使用申请流程烦琐、审批周期长,跨部门协调成本高昂,严重阻碍低空空域的合理高效使用。

第三,低空空域使用安全隐患严峻。在飞行安全方面,无人机“黑飞”屡禁不止,未经审批的飞行活动频繁发生,极易与合法航空器产生冲突,严重威胁空中交通秩序与安全。在国家安全方面,低空飞行器可能被不法分子用于抵近侦察、渗透关键区域甚至发动恐怖袭击,对军事设施、重要机构和国家安全信息构成直接威胁。在公共安全方面,低空飞行器在居民区上空飞行时,可能违规拍摄私人生活场景,侵犯公民隐私;其采集的数据在传输存储过程中存在泄露风险,个人身份、位置轨迹等重要信息可能被非法利用;因设备故障或操作失误,亦可能对地面人员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直接损害。

**价值指引: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法治理念**

面对上述制度困境,推进低空空域使用法治化,需要确立明确的价值指引和法治理念。

其一,动态平衡下的发展和安全并重。作为低空空域使用法治化的核心价值根基,发展与安全不可偏废。安全规制的过度强化可能制约创新动能,而安全底线的失守将引发系统性风险。要为低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以更具前瞻性的政策导向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提供充足的资源支撑,激活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创新,充分释放低空空域的经济价值。但安全终究是发展的基本前提与根本支撑,发展低空经济,绝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来换取短期的经济利益,而是要在筑牢安全防线的基礎上实现高质量发展。

其二,包容审慎下的创新与规范协同。低空经济是技术驱动型产业,正处于发展初期,创新是其核心动力。低空空域使用法治框架应为创新活动预留适度弹性空间,施行兼具包容性与审慎性的监管模式。这要求在及时应对低空经济新业态所衍生法律挑战的同时,避免因规制过度而抑制市场主体的创造潜能。既要通过规范引导创新方向,为低空经济新技术预留试错空间,以柔性监管、容错纠错机制激发市场活力,让创新动能在法治轨道上充分释放;又要通过明确使用边界防范无序扩张,以负面清单、技术标准与动态监测构筑安全防线,不得简单化予以禁止或者不予监管,实现法律责任可追溯与市场秩序可持续,切实保障创新成果的质量与安全。

**制度因应: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法治进路**

实现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妥善解决空域使用“能否飞”“如何飞”“安全飞”的核心问题。

第一,明确低空空域使用的权利属性。低空空域具有经济上的可利用性、功能上的支配性,同时具有稀缺性、完整性与独立性,应将其界定为民法意义上的“物”,并归入自然资源范畴。基于此,低空空域所有权应归属于国家,国家享有对空域的最终支配权。低空空域使用权由低空空域所有权分离派生而来,其突出表现为对空域使用价值的利用,且具备用益物权属性。低空空域使用权人有权在特定条件下对空域进行使用,收益和有限制的处分。在这一私法逻辑框架下,低空空域资源转变为类似于“土地”资源的生产要素,为市场主体依法使用空域、开展商业活动提供了稳定的预期,有利于彰显其作为生产要素的经济价值,推动低空空域资源得到合理开发与利用。

第二,完善低空空域使用规则体系。采用场景化标准设计思路,制定差异化的准入标准和运行规范,以此破除“一刀切”的管理模式。清晰划定中央与地方管理边界,中央着重制定全国统一的空域分类标准、安全底线规则及跨区域协调机制,同时授予地方在法律框架内开展空域规划、区域性规则制定等工作的权限,形成“国家定框架、地方划网格”的弹性治理格局。突破地市、省市之间的界限,整合民航、空管、公安、工信、交通等部门的职责,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管理机制。搭建全国统一的低空经济信息平台,制定地方性协同的划设标准、使用规则及飞行审批程序,以适应低空飞行“规模小、分布散、频次高”的特点,有效减少低空空域使用障碍。

第三,加强低空空域使用安全监管。依据飞行器类型、任务性质以及空域环境的风险等级,推行分级分类的精细化治理模式。在飞行安全管控上,明确飞行审批流程与责任主体,借助先进技术搭建低空飞行监测平台,实现对飞行器动态的实时追踪,一旦发现“黑飞”行为,立即发出预警并迅速处置。在国家安全保障上,划定敏感区域低空禁飞、限飞范围,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建立低空飞行器生产、销售、使用全流程溯源机制,强化对高风险飞行器的动态管控。在公共安全治理上,明确低空飞行隐私保护边界与数据安全标准,规范飞行器信息采集范围、传输加密要求及存储期限,严厉打击违规拍摄、数据泄露等行为;引入低空飞行器责任保险制度,设立飞行事故快速处置与理赔机制,从而构建起覆盖飞行安全、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立体化监管框架。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